

台灣文學傳播研究之方法論析論

須文蔚

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提 要

本文旨在描述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方興未艾的現狀，由於受到理論與方法論多樣與開放的風潮影響，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展現出多元與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定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為討論範疇，透過介紹台灣文學傳播教育與研究之沿革、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之典範移轉以及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之趨勢，從三個層面剖析，讓研究者不但瞭解文學傳播可能應用的研究方法類型，以及從方法論的立場析論，各種研究方法之長處與侷限，以及方法與文學傳播理論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文學傳播 方法論 學科建設 文學傳播教育

台灣文學傳播研究之方法論析論

須文蔚

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台灣文學傳播研究為台灣文學研究中的新興課題，在科際整合的風潮下，原本處於人文學中的文學研究，開始與揉合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傳播學進行整合。在這個嶄新的領域中，不僅有理論的相輝映，更呼應了當代學術思潮中，文學研究有社會情境（context）的轉向，而社會科學研究則有語言學轉向，如是方法論典範變遷與匯流的趨勢。

近年來在文學傳播不僅在大學文學系所中設立課程，且透過一系列的研討會，使跨領域的學者有相互跨越與交融的機會。文學傳播研究和傳播研究一樣，面對質、量方法論典範變遷的衝擊。同時文學傳播研究也面對從研究文學作品（work）轉向文學作品的社會情境，以及從文學作品的社會情境轉向文化文本（text）的研究主題的變遷（Milner, 2005），自應思索在解答不同研究問題時，如何尋求更恰如其份的方法論思考與研究方法，以解答問題，進而建構理論。

由於傳播學的核心觀念就是意義的共享，所有的研究焦點都應當放在人類訊息的交換上（Rogers & Chaffee, 1993: 126）。傳播行為既然是人類活動的基礎樣態，傳播研究課題便應當包括個人發展、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組織、制度、甚至包含整個文化結構（Craig, 1989:2; Friedrich & Boileau, 1990: 8; Rogers & Chaffee, 1993: 129），這

即是傳播學的領域。透過如是開闊的定義方式，傳播科學應當被視為一種整合性的實踐學科 (practical discipline)，研究者在此一學門中，無論是採取批判、詮釋或是經驗式的研究，只要與傳播核心的哲學概念契合，就都會相互牽引(須文蔚、陳世敏，1996)。因此本文在析論台灣文學傳播研究發展上，將從下列三重點入手：一為，簡介台灣文學傳播立科的背景，與重要研討活動與論述出版；二為，分析當代傳播研究質、量方法論典範變遷的趨勢；三為，歸納台灣文學傳播研究不同的方法論立場。

此間無論是中國文學或是台灣文學教學、研究體系，並不缺乏當代美學、文學理論的翻譯與評述的成果，而是缺乏關於文學理論內在的方法、方法論以及知識論的課程、教材與論述，在研究論文書寫時，往往也未就方法或方法論加以陳述與反思。如能進一步瞭解方法與方法論，將有助於善用理論進行實際批評與研究，進一步方能運用理論知識，開拓新的認識與實踐。在文學理論受到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文化研究等學科領域的交互衝擊下，胡經之與王岳川 (1994) 就指出：

藝術方法從模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目的的方式和途徑的狹窄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創立。理論家、批評家大膽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勇敢開拓文學研究的思維空間，從而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

正點出了理論、方法、方法論有必要整體掌握的核心意義，在科際整合的年代，不能僅向其他領域借理論的火苗，更要將方法與方法論的火種引進，文學研究與批評方能真正從理論中得到滋養。本文之所以特別選定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為討論範疇，無非希望透過較為精簡的介紹，讓研究者不但瞭解文學傳播可能應用的研究方法類型，以及從方法論的立場析論，各種研究方法之長處與侷限，以及方法與文學傳播理論之間的關係。畢竟方法與研究法的運用，和方法論與知識論的基本假定與規則息息相關，而知識論又與本體論的假定有關。在科際整合的風潮下，要理解文學傳播研究以及開展理論，自有必要從方法論的角度入手。

二、台灣文學傳播教育與研究之沿革

無論是追溯語藝學的傳統或是大眾傳播研究的歷史，都不難發現傳播這個學門的建制與實務工作的技能訓練，有密不可分的關連（Weaver & Gary, 1980; Friedrich & Boileau, 1990）。不但是傳播教育深受實務傳統的影響，傳播研究也因為來自實務界長期的經濟奧援，而使得研究的方向受到限制與引導。台灣文學傳播教育與研究的緣起也不例外，不過隨著文學傳播理論的深化，相關課程開始趨向理論的介紹。以下就台灣各大學文學院文學傳播課程的開設、文學傳播學程的設立以及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等三個場域，描述台灣文學傳播學科建立的景象。

文學傳播課程的開設

經檢索「台灣文學年鑑資料庫」，首次在本地中文系出現「文學傳播」課程，應當是在 2000 年由顏崑陽為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開設的「文學傳播」。接著，在 2001 年林淇瀟在靜宜大學中文系也開設同名課程，東華大學中文系則將「文學傳播」課程更名為「文學傳播理論與實務」。其後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也設有「文學傳播理論與實務」課程。

以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在 2000 年開設的「文學傳播」為例，這門課採取協同教學的模式，由顏崑陽負責整體規劃與導言，邀請學界與實務界的學者專家計有：李瑞騰、陳雨航、林淇瀟、封德屏、方梓與須文蔚，分別擔當文學傳播理論、圖書出版、副刊、雜誌編輯、報紙編輯與數位文學等子題。從課程安排的內容上不難發現，「文學傳播」引進中文系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中文系學子傳播實務應用能力的目標，這其實和絕大多數「傳播科系」所受到設定「提升實務能力」的教學目標，實無二致。

實際上，大學傳播教育的目標過於趨向實務，已經引發傳播學界的撻伐與檢討。學術界與實務界聲息相通的結果，讓傳播教學與研究在過去一直存在著發展上的障礙。資深的新聞教育學者 Chaffee 就認為，無論是新聞專業人員或是新聞教育的主要贊助者（報紙的發行人），都不知道、關心傳播的學院本質，而僅咄咄逼人地要求教育界對學生施予技術訓練，好讓學生在一畢業後就能夠立即受雇，並且能夠直接投身

新聞的初級工作 (Rogers & Chaffee, 1993: 128)。長此以往的發展，讓傳播學距離大學通識教育與全人教育的目標漸行漸遠，也讓傳播研究者與教學之間產生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中文系在進行「文學傳播」的科際整合時，會將「文學傳播」視為以訓練實務工作為目標的領域，實在無可厚非。但隨後開設的課程，則漸漸傾向理論與實務兼顧的授課模式，具備鳥瞰文學傳播媒體現況的功能，又討論文學傳播在文學批評與研究上的意涵。

在研究所課程上，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在 2001 年開設的「文學傳播理論與實務」課程，應當屬開風氣之先。其後在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設有「台灣文學傳播專題」，將文學傳播的課題，提升到文學研究、傳播理論與當代文化研究相整合的理論研討上，也因此帶進了當代傳播研究方法與方法論討論的議題。

文學傳播相關學程的設立

在「文學傳播」課程設立前，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已經以「大眾傳播學程」的架構，強化同學新聞採訪寫作與編輯的能力。「學程」是指高等教育機構中供學生有系統修一套有目的、有重點、有組織的課程，其中包括課程設計、科目內容、修習方式及完成程序 (楊國樞，1996)。「文學傳播」既然涉及複雜的媒體識讀、傳播理論以及實務操作的意涵，以學程多種課程的設計，自然較能兼顧不同的教育目標。在 2003 年，新設立的靜宜大學台文系，開設有「文學傳播暨劇場實務課群」，以及 2004 年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創辦「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將文學傳播教學與研究更為具體落實。

2003 年 8 月 10 日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成立，在台灣文學研究與教學上，這個新系所課程結構規劃為五大課群，分別為：「文學課群」、「民俗文化暨鄉土教學教材課群」、「語言暨母語教學課群」、「文學傳播暨劇場實務課群」、「台灣研究相關課群」。其中「文學傳播暨劇場實務課群」就十分重視傳播理論、採訪寫作、編輯系列課程的規劃，並配合「傳統戲曲暨母語情境教學專業教室」之硬體設備，以系內的

此一學程已經自九十三學年起停辦。

學程模式，推動多元化的教學目標。

國立東華大學於 2004 年，在人文社會科學院擘畫下，東華大學數位文化中心透過科際整合之理念，協調與整合中國文學、英美文學、臺灣文學、歷史學、人類學、休閒、運動與資訊工程等學門的研究與創作人才，建立「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一方面，考量邁入廿一世紀以後，媒體科技與社會變遷的腳步必將日益加快，學生所需要的傳播教育內涵亦會不斷變遷，不論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甚至電腦網路，都是為了資訊（新聞、訊息）的傳輸，「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學程不是一種組織單位，只是一套學習「資訊傳播與文化傳播」內涵的學習方式，比較有彈性，也較能與時俱轉。另一方面，此一學程的設立還有強化學生第二專長的用意，希望提高不同科系學生進入大眾傳播業、文化創意產業與資訊業的第二專長。總體觀之，「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不僅傳授傳播學的知識與技能，也非常適合於培養公民的生活知識，大有作為媒體素養的深層內涵，有助於提高同學社會關懷的動力（須文蔚，2004）。

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

最早以文學傳播為主題的研討會，當推由李瑞騰規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與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在 1992 年舉辦的「文學與傳播關係研討會」。李瑞騰（1995：1-2）指出，這個研討會旨在從傳播觀點解釋古今文學活動，並討論如何建立文學傳播學及其分枝學科，檢討傳播媒體面對文學的態度和作法，以及討論傳播與文化、電視媒體與人文教育之關係等議題。從方法論的角度觀察這場研討會的成就，與會者大多從文

東華大學的「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課程整合與施行方法為：在基礎必修的課程上，學生必須修習三門與傳播理論、媒體素養與當代文化理論相關的三門課，分別為傳播學導論、新聞學導論（媒體素養）與文化與傳播，共計 9 學分。其他專業選修 15 學分，則儘量讓同學在本系所、共同科的計有課程中選擇二種課程類別，每一類別至少 7 學分，完成整個學程 24 學分的要求。事實上，當代台灣許多學系已經有意無意把傳播科目列入他們的必修或選修範圍，英美系開「新聞英語」、歷史系開「影視史學」、人類學系開「數位民族誌」、管理系開「廣告心理學」、社會系開「傳播社會學」、政治系開「民意」、「政治傳播」等等，或多或少兼具專業與通識的目的，這其實都是「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推動時協調專業選修課程的基礎。至於其他初級製作課程，則進一步將協調地方媒體的工作者開設課程，讓修習通識學生實際體會傳播產業的運作，對於印證學理，當有一定的助益。

學史與傳播史的文獻調查方式，進行研究。

1997 年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聯合報副刊承辦的「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則是第一個以「文學傳播媒體」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活動。本次會議召開之目的，在於從文學、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等多重角度，檢視當今中文報紙副刊的堅持、開創與困境，主題涵蓋中文報紙副刊之歷史、當前臺灣報紙副刊之現況、發展與未來、海外中文報紙副刊之概況、網路與副刊等主題。

回應文學與資訊匯流的風潮，國立台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則以「文學與資訊」為發展重點，在 2002 年與 2004 年分別舉辦過兩次「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0 月 30 日舉辦第一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文學數位、數位文學」，論文內容有古典、現代、臺灣文學網站析評，網路多媒體文學探討，古典文獻數位化研究，文學網站建構等。2004 年 10 月 27 日舉辦第二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文學數位、數位文學」，論文內容有網路化寫作系統、文字學教學研究與中文電腦、歐楷字形資料庫建構、資訊科技協助文學研究、數位時代的文學表現、吞世代與國語文數位化教學之觀察與建議等。這兩屆研討會的特色在於，重視理論與實務的整合，特別是中國文學資訊化的成果檢視與批評，因此與會者包含了學界、業界的學者與專家，並且每屆均舉辦中文資訊化成果展示。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以「文學傳播」為發展重點，在推動文學傳播課程與學程的同時，2003 年與 2006 年兩次舉辦「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成為該系例行與常態的學術重點活動。首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文學傳播與接受」為主題，主要考量近年來文學研究深受文化研究、傳播學等領域影響，文學研究內部也因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之發展，開啟了對「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等議題的熱烈討論，期望學界能藉由「文學傳播與接受」這項新興研究議題，對既有文學及文化現象有新的認識及重新評估，並從傳播與接受的整合對話中樹立「新方法」，也希望能將相關研究成果廣泛的運用至教學、研究、創作及傳播等各項活動中。第二屆會議則以「文本傳播與地誌書寫」為主題，將文學傳播與空間、地誌書寫、自然生態寫作、文學觀念的流變等議題進行創新的整合。「地誌書寫」乃是一種地方書寫，亦即透過特定地方或景觀的描繪，牽引讀者去認識或建構一個地方的歷史人文

特色，常帶有土地認同的情感意義。時過境遷之後，原先留下的地誌書寫，必然期待未來的讀者，重新叩訪並開啟其中的奧義。另一方面，站在讀者、出版、文學集團乃至於數位化的觀點審視文學傳播，會發現文學研究衍生出許多新鮮的面向。

在建構文學傳播理論上，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於九十三學年度創辦以來，即以文學傳播研究為發展重心之一，因此在 2006 年舉辦「台灣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台灣文學傳播」，係以台灣文學的傳播研究為範疇，針對台灣新文學發展以來，文學傳媒（包括報紙副刊、文學雜誌、文學出版、網路等媒體）與台灣作家、讀者的互動關係為討論對象。台灣文學傳播與媒體的關係頻繁密切，文學資訊之流通、作家作品的刊登、乃至於文學思潮的湧動、文學運動的開展，無不透過媒體載具進行，因此探討台灣文學與媒體的關係，也就有助於釐清台灣新文學開展以來盛衰起落的種種現象，並對台灣文學歷史、思潮和社群的變化有所掌握。

三、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之典範移轉

在研究主題上，傳播研究中之傳播者研究過去重心一向放在大眾傳播，特別是在政治傳播、新聞媒體研究、傳播效果等領域（鄭瑞城，1988；翁秀琪，1992）。近來受到文化研究之衝擊，不少研究者轉而投身通俗文化之研究。林芳玫（1994）即提出「文學社會學的多重互動模式」，主張不應在文本、作者或讀者等孤立單位中尋找意義的所在，亦即意義不是被動的存在物，而是社群成員互動過程中所共同構築起來的，沿著文本、作者、讀者、類型、文學社區、組織與工業化、制度、社會等八個分析單位，而形成一套意義建構的軌跡，意義在這條軌跡上來回移動……意義是一社會建構過程，而非僵硬固定的存在物體。

從文學傳播研究近年來的發展不難窺知，在不同研究典範，從早期的實證論、否證論、歷史主義，到其後的批判主義、詮釋學、現象學、唯實論、結構理論、女性主義的出現，所謂的「文學傳播研究研究方法」可說是眾聲喧嘩，並沒有一套固定的、機械化的模式可以遵循。文學傳播研究多元化的發展，使文學傳播方法論的討論上，不但必須理解量化的研究方法，更必須重視質化方法的影響力。

傳播學方法論的典範移轉

傳播學的發展上，過去長期受實證論的量化方法典範支配，近年來，受到批判理論、現象學、詮釋學等理論的衝擊，開始有量化與質性研究方法論之典範爭論。

量化研究採取的實證論觀點，可以稱為客觀研究途徑在認識論 (epistemology, theory of knowledge) 層面的表現 (Burrell & Morgan, 1979: 3)。實證論所謂的科學，也就是 Habermas (1988: 13-16) 所稱的「經驗性 - 分析性的科學」 (empirical-analytic sciences)，實證論者提供經由計算控制生活的技術知識，以滿足人類的需求。這一類型的知識建立在經驗統一性的知識基礎上，關注技術性的控制，藉著律則性假設的檢驗，說明因果關係，甚至希望建立一套預測因果關係的通則 (Kaplan, 1964; 須文蔚、陳世敏，1996)。在研究方法運用上，通常研究者會採用問卷調查、實驗設計或是內容分析法等量化研究方法。

傳播研究的初期，雖然芝加哥學派相當重視文化與社會因素，但是其後的社會科學典範卻轉移了焦點 (Delia, 1987)。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在行為科學研究的典範籠罩下，重視如何從因果關係推斷的法則理論、社會規範與個人詮釋乃至系統理論的全面觀照。因此傳播理論不但被設定為一組相互關連的命題，其中某些命題可以被驗證，更因為傳播理論的創造者恆常期望透過一組相互關連的命題，來解釋 (explain)、預測 (predict) 以及控制 (control) 傳播現象 (Infante, Rancer & Womack, 1993)。然而在質量方法論的典範移轉爭議上，對實證論的主要抨擊是，實證論所呈現的世界觀，僅能使研究者孤立於狹小的範圍內，結合統計方法的運用，以求變項間的直線關係，這就隱含了一個基本預設，即世界是靜態的機械結構，必須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的情況下，把一個活活潑潑動態發展的世界，毫不自覺地化為一片死寂的物質世界，然後從整體中抽取部份，設定自依變項，來求其關係。

相對注重客觀的、經驗的和運用大量抽樣與統計分析的方法，質化研究則強調人文學科的系統化、有效率的分析方法，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以及詳細描述研究場景，企圖對整體事件的始末採取整體主義 (holism) 或網絡主義 (contextualism) 的通盤理解態度，因此研究就更有彈性，常有超越研究者預期的意外發現 (Jensen, 1991:

31; 劉仲冬, 1996: 131-133)。研究者常使用的方法計有, 參與觀察、民族誌法、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口述歷史、紮根理論等。

當然質化研究的證據方法也有其限制之處, 從實證典範的標準觀之, 其至少有下列侷限: 一、質化研究的樣本選擇過小, 而且常利用立意抽樣或方便抽樣方法, 其樣本往往不具代表性; 二、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解釋都是主觀的、非數量化的, 往往要仰賴研究人員的經驗與能力, 有時難免會因為主觀偏見的介入, 而影響結果的可靠性。三、質化研究常常缺乏一套可遵循的步驟與規範, 也就影響到研究的信度 (黃俊英, 1996: 339-340; 劉仲冬, 1996: 138)。

傳播學界在這一場爭辯中, 從方法論上的爭議點燃戰火, 膠著在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同異之辨 (劉駿州, 1992)。到近年來, 傳播學門正視人文學科注入的力量, 跨出方法論的爭議, 回復到理論建構層面來檢視傳播學發展的方向。但在此時回顧傳播學發展歷程, 一方面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由對立邁向並存, 另一方面仍宜檢視引起爭議的問題所在。

上述說法似乎言之成理, 然而經過論證, 其中任何一者都使得社會科學家產生邏輯與操作的問題。因此在社會科學典範中, 受到實在論的影響, 開始有學者主張, 放棄自然科學所追求之通則。不追求普遍法則, 則社會科學的方法典範, 應當加以修正 (Secord, 1986)。當然, 過於簡化與強調對實證典範的攻擊, 不免一筆抹煞實證論者對於社會科學的貢獻, 而且這些對實證論發出近似戰鬥性的叫陣, 以簡單的二分法來看待不同典範間所可能動用的方法, 忽略了實證論與人文學科間的競爭往往不是在資料蒐集層次, 而是表現在理論以及政治與社會立場的差異 (Peter, 1993)。

在方法論的層面上, 傳播學者 Rosengren (1993) 由「理論」、「定型模式」以及「實證資料」三者的互動與印證 (translation) 上, 來評價目前的傳播理論。他認為, 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 無論是目前浮現的傳播研究傳統, 乃至於以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為傳統的傳播研究, 都發生了理論、定型模式與實證資料間缺乏本質互動的現象。因此, 縱令有堅實的理論與令人印象深刻的實證資料, 缺乏定型模式, 往往無法進行科學的「否證」與「比對」的過程, 則如何建立一套評價的標準, 自然令人心存懷疑。而另一方面, 缺乏印證, 將妨礙強而有力地建立通則 (generalization); 互動的罕見,

將使得不同學門積極的對話與合作不存在，如此將使得整個知識環境沒有累積的成長。

如果以上述標準檢視傳播研究的發展，不難發現傳播學術環境中已然發展出獨特的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 (uses and gratifications)、生活型態取向 (lifestyle-oriented) 研究以及收訊分析。這三個研究取向有其共同的特徵，亦即在理論探索的過程中，從描述性研究進步到解釋性研究 (透過定質的方式建構理論與定型模式)，再蒐集與累積更多的「實證資料」以後，顧及信度與效度，構成定型模式，已經使三個研究更加成熟，這也使得三者的發展更為深化 (須文蔚、陳世敏，1996)。

文學傳播學方法論的典範移轉

文學傳播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從科際整合的角度觀之，亦有方法論典範移轉之趨勢。比較文學學者 de Zepentnek (1997) 即主張，文學研究應當走向文化整體性和經驗主義研究法複合的途徑上，亦即文學研究除了重視詮釋之外，也要立足於觀察，其次建立在通過資料蒐集得到的經驗主義論據上，注重多元學科與科際整合。他的觀點與 Rosengren 的想法不謀而合，特別在文學傳播這個整合文學與社會科學的領域中，特別有參考價值。

文學傳播在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給予更多元的啟發，是研究者能透過就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文學社會學與傳播理論的探討，更貼近人文學科的思維與洞見，並藉著經驗研究之實證資料分析，將觀念置於嚴格的「驗證」與「否證」架構下，儘量達成建構定型模式之理想。就台灣文學傳播不同方法論典範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在下節分析，而就理論建構與方法論層面，以下先就西方文學傳播研究環境中，在典範移轉的風潮中，能兼顧質、量方法，構成定型模式者，諸如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以及義大利比較文學家 Moretti 之方法論觀點，加以闡釋。

Bourdieu (1984 ; 1992) 的文化資本、生存心態與文學場域理論與方法論的提出，既有豐富的社會學理論、文學傳播理論、文學史資料的描述與文獻分析批評，更擴充量化資料的援引，強化了描述層面，進而進到了解釋層次，建構出定型模式。事實上從方法論層面觀察，Bourdieu 的研究至少整合下列三種型態的方法論思維：一為，有別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者，他創立了「建構的結構主義」或「生成的結構主義」，強調

社會世界亦存在客觀結構，此結構獨立於行動者的意志和意識，可以影響和限制行動者的行動方向和他們的思想觀念（高宣揚，2001：21）。二為，有別於傳統的意識型態論者，他強調場域的動態面就是行動者依據其所在的位置，以及所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包括經濟的、文化的或其他形式），奮鬥努力以爭取對自己更有利、或更有價值的位置或處境，場域的動態面因此是具體的實踐活動，並不能化約為任何結構決定法則（張錦華，2002：72）。三為，透過實在論的方法論立場，以調查法分析文學讀者「生存心態」在實踐中的實際表現，探索其歷史軌跡和實際影響，揭示其再生產過程之內在動力和外在表現網絡。一言以蔽之，Bourdieu 的研究達到建構定型模式的理想，實因他採取「相關性原則」的認識論，探討主觀與客觀因素在實踐過程中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現象和邏輯，從而把傳統理論和方法論加以分割和對立化的主客觀因素，在其實際相互滲透的運作過程中進行探討，得以開拓出觀點充實與遼闊的研究成果。

同樣致力於建構定型模式，採用多重方法論，也注意到文學傳播影響文學史書寫者，則是史丹佛大學教授 Franco Moretti。他的小說史研究有別於傳統的小說經典的引介，採取文學地理學、文學史以及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建構新穎的文學史模式（Moretti, 2003）。Moretti 建構十九世紀小說史時，就另闢蹊徑，希望展現出文學史「真實面貌」的另一途徑，不以正典為主，也觀察一般書籍出版、傳播與閱讀的樣態。他以文學地理學為基礎，文本量化的內容分析為輔。在鉅觀面，他觀察在空間差異下，文學正典型塑力量的差異，透過分析不同地區圖書館典藏百年來「正典」的數量差異，以及不同地區的出版社出版「正典」的狀況等，Moretti（1998：154-155）考察 37 個英國與 50 個法國的圖書館所收藏的小說，發現了與該國文學典律的關連性相當高，尤其在鄉鎮圖書館的狀況尤其明顯。在微觀面，他分析，小說中地誌書寫與真實地理空間的比對，展現出解讀小說的新方法。Morretti（1998：12）這種將文學史以「符號形式的社會學」以及文化常規（cultural conventions）的歷史加以重寫的模式，在方法論上，既顧及了人文學方法論中歷史—社會批評的模式，又能結合量化研究與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確實打造出觀點迥異的小說史面貌。

四、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方法論之趨勢

文學傳播在台灣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研究成果數量已經日漸豐富，由於學科發展正處於傳播學方法論多元化的時刻，因此呈現出理論與方法多元化的趨勢。不過理論發展的多元不代表研究工作是混亂、漫無標準可言的。畢竟每一種傳播研究傳統都會有其規範，因此文學傳播研究者面對不同研究傳統以及領域時，不可單就理論的結果或是部分觀念加以援用，有必要清楚陳述理論的意涵，更要瞭解理論背後的知識論、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為何？實為研究者在研究理論之餘，更應進一步探索的課題。以下茲就台灣目前文學傳播研究成果中，從文學史、批判理論、實證論、現象學與詮釋學等不同方法論立場研究者，不同的方法論觀點，分別闡述。

文學史方法論下的文學傳播研究

從文學史方法論的角度切入文學傳播研究，能從文學史料中檢視作家、文學出版、文學媒體、文學政策等議題，可以重新建構文學史。

李瑞騰（1988；1995a；1997）一系列的研究即從文學媒體的史料入手，進行文學傳播的研究，進行雜誌、副刊或詩社的歷史爬梳，針對文學媒體創辦動機、發展過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主編特色與風格變化等議題，進行歸納與分析，進一步探討文學媒體在文學史上之貢獻。在方法論上，他強調文學傳播研究必須歸結到歷史脈絡上，同時應以具歷史性的視野對文學傳播現象進行研究與分析。在具體研究方法運用上，他除了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歸納與展現文學媒體或文學集團的集體意識與文學主張，並針對文類型態動用了統計的頻率分析，深具實證精神（1995a）。

後繼者如解昆樺（2004）就指出，文學典範內部中衝突與融合的問題，如果能透過傳播情境加以分析，就能剖析出文學社群如何透過媒體建構自身典範？不僅如此，各個文學媒體典範間的差異背後，往往涉及文學社群面對政治文藝審查制度、商業營利機制的規範與排擠，所選擇不同因應之道，方才構成不同詩學典範意義。他的研究方法不僅限於文獻分析，更利用質性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深化研究發現。

批判理論方法論下的文學傳播研究

向陽 (1995) 以文化霸權論建構副刊學理論，將批判理論與意識型態分析方法，導入文學傳播研究中，亦為一大突破。其後向陽融合政治經濟分析與文化研究觀點，進行台灣文學傳播研究，其方法論立場傾向援引 Hall (1979, 1982) 的觀點，由意識型態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切入，在語言和論域中探討意識型態如何透過語言符號的接合來運作，如何透過「表意的政治學」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來介入爭議性與衝突性的社會議題中，而成為鬥爭的場域等核心問題，並歸結到意識型態的再發現、語言的政治與社會之表意方式及符號與論域的政治策略等三大範疇中。

相對於向陽比較重視文獻分析，林芳玫的研究比較傾向批判理論的經驗研究，也較常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如民族誌法或深度訪談法，以期發掘社會的深層結構，以便進行批判。林芳玫 (1996) 就以日本戲劇《阿信》的閱聽人為例，證實了文本的多義性，以及不同讀者會隨著社會脈絡、性別意識、教育層度等因素的影響，進而產生不同的解讀策略。

實證方法論下的文學傳播研究

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深受文學社會學家 Robert Escarpit 的方法論影響。Escarpit (1958，葉淑燕譯，1990) 以實證研究的調查與內容分析資料，得出世代、文人圈、班底、媒體在文學史與當代的樣態。

近年來，文學傳播研究不斷推陳出新，以文學媒體中文學獎、文學論戰、文學作品選集、數位文學媒體等主題 (焦桐，1998；楊美紅，2001；巫維珍，2001；須文蔚，2003)，相繼出現的論述，均可見到實證方法論的影響。

其中特別以內容分析法的運用比較常見，內容分析法是運用一套科學程序，客觀及系統性地從內容作有效的推論，並求取定量性的資料。內容分析法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廣為運用，諸如傳播研究、文學研究、歷史研究與政策研究等，運用文獻配合統計分析的方法，都行之有年。其特點在於屬非親身訪查技術，可避免實驗法、調查法、田野研究所等親身訪查技術常造成因受訪者引起之偏差。諸如孟樊 (2004) 就

台灣新詩集出版的分類，以重新建構新詩發展史；或如須文蔚（2004）就《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進行內容分析，瞭解作家特質，均屬之。

現象學與詮釋學方法論下的文學傳播研究

在傳播研究中，近年來不斷有向文學研究借火的現象，最著稱者莫如閱聽人研究從文學讀者反應論上得到啟發，進而發展出接收分析等嶄新的研究類型。反之，讀者研究無論在古典文學研究，抑或是現代文學研究上，也開展出多重的研究新取向。

在文學讀者研究上，當以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理論最受矚目。接受美學理論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價值及其審美效果在其歷史接受過程中無疑會不斷地變化、發生或轉移，讀者對作品的理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對過去作品的欣賞是傳統評價與當前文學的品味融合而來的（蔡振念，2004）。

同時，亦有從詮釋學與現象學的角度，重新省思中國文學閱讀理論者。例如楊玉成（2004）就以戰國讀者為例證，因為：

戰國時代這三方面均已高度發展：首先，說話者，儒家的正名重視說話者的道德修養及命名對社會的影響，接近某種倫理論證；其次，語言自身，諸子百家對語言的規則（修辭、論辯、邏輯）已有深刻的討論；最後，聽眾與接受者，這是本文尤為關切的課題：大致上，從稷下面對群眾或君王的啟蒙，到縱橫策士轉向王侯進行遊說，晚期貴遊文學出現，閱聽關係迭經重大的改變。這三個因素（遊士、語言、聽眾）相互關聯，相互界定，藉此可大體勾勒戰國閱讀狀況的主要輪廓。

在楊玉成的努力下，也開展出詮釋學角度的閱讀理論與方法論，殊值重視。

五、結 語

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方興未艾，受到理論與方法論多樣與開放的風潮影響，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展現出多元與豐富的研究成果，雖然目前研究成果比較鎖定在特定主

題，多為沿襲與應用當代傳播理論，距離建構理論與定型模式尚有一段距離，相信假以時日，當有更豐碩的風貌。

傳播學術的發展和傳播知識的特性有先天上的關聯，傳播學具有濃厚的知識應用 (knowledge utilization) 的特性，不同於其他基礎學科，是一門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學科。舉凡科技移轉、資訊傳播與應用、研究應用、創新傳布 (innovation diffusion)、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組織改革、政策研究、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都具有知識應用的特質 (Backer, 1991)。文學傳播學的教學與研究亦然，如何擴大文學傳播相關知識適用範圍，讓學生在從事文學傳播工作前，具有使用和綜合知識的能力，以期更能解決問題與掌握環境，實為研究者不能輕忽的議題。

傳播學固然從一開始就是由不同領域學者在「傳播的十字路口」逗留下的產物，其後的發展也朝向不斷與其他學門整合的趨勢。文學傳播固然是從其他學科「接枝」而來，但是並不意味著文學傳播學者只是不斷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未來研究者應當不斷反省者有下列問題：台灣文學傳播研究是否能發展出理論與方法論，能夠與其他領域互通聲氣？是否已經確立文學傳播學的核心概念？

在文學傳播研究發展上，仍然要面對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內在的衝突，同時就古典文學之文學傳播研究，更受到材料的限制，使得研究的開展需要更具創意的的方法論思考，方能有更具體的進展。

未來值得更進一步就台灣文學傳播方法論議題討論者，當屬如何建構本土方法學的議題。畢竟西方的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未必能照單全收，而且方法並非價值中立的，哲學家 Blaikie (1995: 202-203) 就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差異追溯到研究者本體論與認識論基本假定的歧異，簡言之，本體論上實在論與建構論的對立，加上認識論上「置身事外」與「參與其中」的研究位置的差異，使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有了多元的發展，也凸顯了每一種方法論皆有其根深蒂固的認識論與主體論，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息息相關。那麼從方法學本土化的角度思索，下一階段文學傳播者能否有更清晰的主體意識，理論的認識與世界觀，並能更多元地操作不同的研究工具，相信是首要的工作。

同時，研究者如能從中國文學上特有的史傳文學、題壁詩、評點、方志、文人集

團等主題入手（陳世敏，2002），整合中國特有的經學、理學、訓詁、考據的方法論線索，從本土思想家既有的本體論、認識論、形上論、方法論，或不失為文學傳播發展的新方向。

參考書目

-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1995）：《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向陽（1995）：〈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1995）：《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193-226。
- 巫維珍（2001）：《台灣書評發展史：1972-2000》，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瑞騰（1988）：〈八十年代香港的新詩界——以文學刊物為中心的討論〉，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1988，香港大學，香港。
- 李瑞騰（1995）：〈（代序）文學與傳播〉，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I-II。
- 李瑞騰（1995a）：〈後期文季研究——文學媒體編輯觀點之考察〉，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227-252。
- 李瑞騰（1997）：〈光復初期新生報《文藝》副刊研究〉，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1997.01.10-12，聯合報副刊。
- 孟樊（2004）就台灣新詩集出版的分類
- 林芳玫（1994）：〈雅俗之分與象徵性權力鬥爭——由文學生產與消費結構的改變談知識份子的定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6期，頁55-78。
- 林芳玫（1994）：《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出版。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台北：巨流。
- 胡經之、王岳川（1994）：《文藝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 高宣揚（2001）：《布爾迪厄》，臺北：生智。
- 張錦華（2002）：〈從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主體〉，《傳播理論》，頁61-105。

- 陳世敏 (2002) : 〈華夏傳播學方法論初探〉, 《新聞學研究》, 第 71 期, 頁 1-16。
- 焦桐 (1998) : 《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 時報。
- 須文蔚 (2003) : 《臺灣數位文學論》, 台北: 二魚。
- 須文蔚 (2004) : 〈兼具知識與社會實踐通識教育規劃——以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為例〉, 《通識教育季刊》(已審查通過, 出版中)。
- 須文蔚 (2004a) : 〈臺灣文學傳播者之特質分析〉, 收錄於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 頁 511-544, 台北: 洪葉。
- 須文蔚、陳世敏 (1996) : 〈傳播學發展現況〉, 《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三集, 頁 9-38。
- 黃俊英 (1996) : 《行銷研究》。台北: 華泰。
- 楊玉成 (2004) : 〈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論〉, 收錄於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 頁 145-242, 台北: 洪葉。
- 楊美紅 (2002) : 《台灣大眾媒體文學書評之研究——文學社會學的詮釋觀點》。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楊國樞 (1996) : 〈現行學制的檢討與改進〉, 《教改通訊》,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
- 解昆樺 (2004) : 《論臺灣現代詩典律的建構與推移: 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劉仲冬 (1996) : 〈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及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及出路〉, 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化研究》。台北: 巨流。頁 121-140。
- 劉駿州 (1992) : 〈「辨」而不「辯」——質量方法的初探〉, 《新聞學研究》, 第 46 期, 頁 95-109。
- 蔡振念 (2004) : 〈論李白對謝朓詩歌的接受〉, 收錄於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 頁 243-264, 台北: 洪葉。
- 鄭瑞城 (1988) : 《透視傳播媒介》。台北: 天下文化。
- Backer, T. E. (1991). Knowledge utilization -- The third wave,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utilization*, 12(3): 225-240.
- Blaikie, N. (1995).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2). *Les regles de l'art fre.* , 劉暉譯 (2001) : 《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
- Burrell, G. & Morgan, G. (1979).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sational analysis*. Brookfield, VT: Ashgate Publishing.
- Craig, R. T.(1989). 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 In Dervin, B., Grossberg, L..., O'Keefe, B. & Wartella, E. (Ed.). *Paradigm dialogues in communication; Vol. I: Issues* (pp.97-12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e Zepentnek, S. T. (1997). Legitimiz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馬瑞琦譯：《文學研究的合法性——一種新實用主義：整體化和經驗主義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20-99). Beverly Hills, CA: Sage.
- Escarpit, R. (1958).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葉淑燕譯 (1990) : 《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
- Friedrich, G. W. & Boileau, D. M. (1990).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Daly, J. A., Friedrich, G. W. & Vangelisti, A. L. (Ed.) *Teach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pp.3-18).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Habermas, J.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NicholSEN, S. W. & Stark, J. A.,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Hall, S. (1979).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 Curran, et al.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rverly Hills, CA.: Sage, pp.315-348.
- Hall, S. (1982).The rediscover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G. Michael,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pp.56-90.
- Infante, D. A., Rancer, A. S. & Womack, D. F. (1993).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Jensen, K. B. & Jankowski, N. W. (1991).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aplan, A. (1967).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 Milner, A. (2005). *Literature culture &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Moretti, F. (1998). *With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London: Verso.
- Moretti, F. (2003).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24: <http://www.newleftreview.net/Issue24.asp?Article=05>.
- Peters, J. D. (1993). Genealogical note on "The Fie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32-139.
-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 Rosengren, K. E. (1993). From field to frog pon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3), 6-17.
- Secord, P. F. (1986).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n life situations'. in Fiske, D. W. and Richard A. Schweder (Eds.) *Meta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aver, D. H. & Gary, R. G. (1980).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 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 1, pp.124-151.

The Status Quo of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Hsiu, Wen-w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mes and trends of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It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s a discipline.

With focus on the methodological theor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the analytic study has a three-fold research purpose: First, it i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regarding the practices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Second, it i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paradigm shift of methodological theory applied o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Third, it i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methodological theor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Accordingly, the study offers the field an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possibility of research categories and method applications. Moreover, it offers researchers rich document on various academic arguments,

points and limita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Keywords: literary communication, methodolog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s a disciplin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